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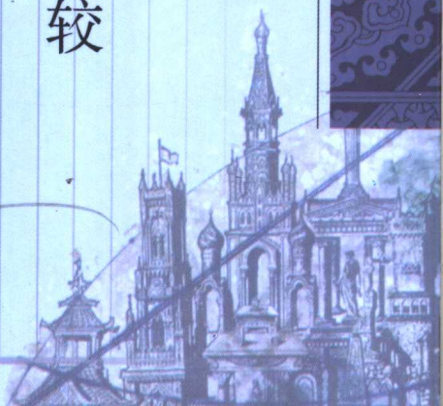
元 亨 文 存

断裂与重构

中西思维方式演进比较

◎ 谭元亨 著

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



B804/12

2007

断裂与重构

——中西思维方式演进比较

谭元亨 著

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断裂与重构: 中西思维方式演进比较/谭元亨著. —广州: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, 2007. 12

ISBN 978 - 7 - 5361 - 3607 - 6

I. 断… II. 谭… III. 思维方式 - 对比研究 - 中国、西方国家 IV. B80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71683 号

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

邮政编码: 510500 电话: (020) 87554153

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 850 mm × 1168 mm 1/32 印张: 9.5 字数: 248 千

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~ 1500 册

定价: 18.00 元

序 言

认真说起来，这部副题为“中西思维方式演进比较”的书，应是中西方思维发展史的比较，但为何仍沿袭这个书名呢？最不成理由的理由是，我已于21世纪初开设这门课程，至今已有5个学年了，再去改名，放弃了这个“品牌”未免有些可惜，不妨还这么用下去吧。而最重要的理由是，作为一种思维方式，并非是先天就有或一蹴而就的，须有其发展、演进的过程，而这自然呈一种动态，直到今天也是不可能一成不变的。只有这种发展史或演变史上的比较，方能真正对思维方式加以剖析，凸显出差异，说明为什么会这样而不会那样，否则，任何比较，也都只能是隔靴搔痒，让人不得要领。所以，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，方可说明思维方式自身。叩问历史，才能知晓人性，也才能认识与理解不同民族所形成的不同的人文精神，同样，方可以理解各自的思维方式。例如印度，人家擅长细致的内省、语言分析以及辩证法与逻辑；中国人亦不乏相对主义、辩证思维及中庸精神，从而拥有悠久传统的审美情怀与道德化的社会生活。在西方，科学精神当是相当凸显的，但若只认可“德先生”（民主）、“赛先生”（科学）则未免有些偏颇，时下西方非理性主义不也大行其道，宗教迷狂亦时有发生吗？……因此，在这些方面，任何简单的概括和比较，每每取静态的、固化的方式，就很难切中要害，难有真知灼见了。

在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有幸绕了地球一圈，与西方一些学者作过交流。这次外出的成果，一是写出了那部名噪一时的《闯荡全球的无效护照》，全国数百家报刊转载、连载或选载，

还在北京得了个奖，时至今日还在再版；另一个，便是这部关于思维方式的书，有的章节先期作为论文发出，相当一部分内容则出过一部小书，而后又成为了教材。之所以要写这么一部多少有点艰涩的理论专著，恐怕是因为绕地球一圈的经历，恰如今日看了刚获奥斯卡奖的名片《巴别塔》的感受一样，由于语言、文化的隔阂，思维方式上的不一样，无形中给人类造成了多少难以言喻的痛苦。先哲云，痛苦，正是一切哲学的源头。诚哉此言。

的确，这是痛苦的产物，读过另一部《无效护照》，我相信大家都会意识到这点。在对外交流中，由于语言文化、思维方式的不同，当产生多少误会，惹出多大麻烦，闹出多少乱子，从而造成怎样的痛苦？！为此，无论这本书写得怎样，毕竟还是值得一写的。况且在大学开这一门课受欢迎的程度，更证明它应该写。

坦率地说，把东西方思维发展史放在一起加以比较，似乎还没见有人做过，至少，没有这般宏观、系统地去做过，这对我这半路出身的作家而言，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。因此，我也不求其严谨，却只望它有所感悟，能闪烁出几点思想的火花；同样，形式上也不拘一格，尽可能生动、耐人寻味一点——这，似乎并非对学术著作的要求，可既往的学术著作，就那么规范、严苛么？“断裂与重构”这个书名，也就这么确定的，未必是完全准确与严谨的表述与概括。

那就按照现在这个样子，再度呈现给世人吧，说长道短，都衷心地欢迎。

谭建

2007年5月31日

目 录

序言	(1)
导论	(1)
第一章 语言与思维方式	(8)
第二章 作为历史科学的思维学	(14)
第三章 思维演进的历史背景:延伸与断裂	(24)
第四章 历史与现实的中西方思维的误区	(51)
第五章 西方:思维的感性阶段	(79)
第六章 中国:自然直观思维与伦理化思维	(99)
第七章 西方:思维的理性阶段	(113)
第八章 中国:悟性思维与后伦理思维	(128)
第九章 西方:思维的非理性阶段	(141)
第十章 交叉与耦合	(152)
第十一章 比较与借鉴	(160)
第十二章 思维方式与历史构想	(169)
第十三章 生态思维——中西方思维的一次整合	(211)
第十四章 具体思维操作比较(一)	(239)
第十五章 具体思维操作比较(二)	(258)
结束语 整合与重构	(267)
附录1 世界史上两大宗教改革之比较	(276)
附录2 超越时空:思想家的命运与思想的命运	(286)

导 论

20 世纪 90 年代末，本校的学报向我约稿，说任我写点什么都行。从理论研究上而言，我的重心一直放在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上面，也出了不少书。但“任写什么都行”这句话，却挑起了我的“出格”的欲望，也就是跳出本行去写点不曾写过的东西。于是，一篇《当代思维：意念性与悟性》的论文，一万余字，竟随手拈来——的确是“任写”出来的。

不料，文章出来后，竟受到方方面面的关注，认为当今论及思维科学的各类专著、论文中，这算得上是一篇“奇文”，当“奇文共欣赏，疑义相与析”，令人感到焕然一新，颇有创见，且有深度，无论是在内容与形式上，还是在视野之开阔与聚焦上，都不同一般……这颇让我受宠若惊，在我，这完全算是“半路出家”，偶尔为之罢了。

当我这么努力表白“中国人的谦虚”之际，一位理论界的朋友却直摇头：“你不更是一位作家吗？小说写了几十部，这偶尔为之的东西，当是灵感触发的结果，称得上‘神来之笔’了，有什么可自谦的。”

当然，我绝对不敢把自己的作品称之为“神来之笔”，这未免太不知天高地厚了。不过，朋友的说法，却引发了持久的思考。的确，我们的很多成果，无论是理论的建树、科学的发现，等等，并不是什么深思熟虑、长久积累，从而登堂入室的结果，而只是蓦然回首、冷地触发而来的，未必讲得出个来龙去脉、子丑寅卯来——这其实也就是我那篇文章的主旨：意念性与悟性。

正是这些感悟，使我在写这篇文章之前，星星点点地记录下了自己对人类思维在历史进程中的延续、塌陷与断裂的若干感想。朋友们知道了，说这才是好东西，还不赶紧整理出来，把“奇文”变成“奇书”好了。

于是，便有了这样一部“奇书”。

说它奇，倒不是人们常用来夸奖的那个词，而是想对读者说，在体例上，它恐怕很难套进现成的模式，尤其是很难成为一个系统，别说体系了，好在这个是个解构主义的时代，人们已对体系不屑一顾了。同时，它恐怕也不是纯思维论的东西，它每每跳出去，论及历史，论及文化，乃至文学艺术，包括建筑在内，颇有点天马行空、独往独来的意味，只顾自己洋洋洒洒胡说一气。连形式上，更有对话、描写、抒情、叙述这些非理论专著的写法掺杂在内，太随心所欲，太任意妄为了点。

作为这部书的“大哥”——《中国文化史观》，至少在体例上——从目录上便可以看出，其理论架构是相当严整的，尽管写到后边也俏皮了起来——改不了搞文学的本性，但比起这部来说，倒是很一本正经的。其实，做理论，难道不可以一样活波调皮一些，激情洋溢一些，无拘无束些吗？

思维本身就是开放的，一如庄子所云：

精神四达并流，无所不及，上际于天，下蟠于地……

也如陆机在《文赋》中称：

精骛八极，心游万仞。

思风发于胸臆，言泉流于唇齿。

于是，在这本小书里，似乎把什么旁门左道、异端邪说之

类，全纳入了思维演变的研究范畴当中，不独是几位大师、巨匠或帝王、教主。这样一种无所不包的，不仅讲历史、讲文化、讲科技，也讲民俗、讲风水……开放的观照，弄不好，也会走火入魔，不知生出个什么“怪胎”来了。但我仍不想节制或约束自己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不必装出讲道者的一本正经来。这也有点像《中国文化史观》后边关于当代史观的表述一样，随意性压过了逻辑性，天生地改不了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表述方式。

如果说，从《中国文化史观》到这部《断裂与重构》当中，尚有一个过渡的话，那便是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主编的《世界著名思想家的命运》一书。这本书洋洋近 70 万字，序言与相当大部分的正文其实都是我亲自撰写的，只是变换了不少的笔名。这本书，当是这部当代思维专著的“旁证”或参考书。为此，本书附上该书的序言《总论》。

前边，我说到思维演进史中，不仅仅是几位思想家、哲学家，后面，我也将详尽地阐述在这方面的认识与见解。但是，这里我丝毫没有否认他们在历史上、尤其是思维发展史上所起到的重大作用，以及在某些时段中的标志性意义。

所以，在名为“思想家命运”的这样一部书中，我也只能突出这些历史人物存在的影响与作用。通过这些人物的沉浮、显隐，去证实思维发展的曲折与多舛。

在这部书的序言中，我这么写过：

思维的每一个变化、发展与飞跃的成功与否，对于当时的历史时代与社会所起的作用与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，它完全是创造的源泉，它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，可以毫不迟疑地称：人类所创造的每一样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，实际上都是属于思维的结晶。“文艺复兴”在西方带来的科学文明的发展，众所皆知；而启蒙思想的夭折，给中国带来的倒退

与落后，更是有目共睹。这样的历史教训还不够深刻吗？

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，我没有把世界著名思想家按地域或按中外划分，而是把他们按各自出生的年月的先后顺序排列了下来——在某种意义上，这是以精英为主勾勒出一部思想史了。

这样读下来，我们就可以读出书本之外的一些内容来，有了一个清晰的比较。

例如，像在老子、孔子、墨子、庄子、韩非的时代中，西方也有诸如毕达哥拉斯、苏格拉底、德谟克利特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大致算得上旗鼓相当吧。

而在王充、郭象、刘勰、范缜、钟嵘、韩愈、王安石、柳宗元、李觏，其间，尤得强调，作为南禅宗的创立者、中国古代圣哲之一——惠能等出现之际，西方几乎是一片空白，仅可一提的是“上帝之城”与“撒旦之城”的理论提出者圣·奥古斯丁。

当力陈“童心即真心”的思想家李贽被迫害致死的同时，西方也有布鲁诺被送上了火刑台，矛头直指封建皇权、认为帝王“为天下之大害”的黄宗羲未得善终之际，也当是伽利略被囚禁之际，但是，人家的牺牲是以不断的进步为代价的，其时，仅就这部书中涉及的思想家，便有经验哲学的创始人弗朗西斯·培根、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、机械唯物主义奠基人霍布斯、大哲学家笛卡儿、政治思想家约翰·洛克、近代唯理论哲学的代表斯宾诺莎、大学问家莱布尼茨、空想共产主义者梅叶、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、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、不可知论的创始人休谟、集思想家与文学家于一身的文化大师卢梭、百科全书之父狄德罗、大哲学家康德、黑格尔、美国民主思想的奠基人杰斐逊……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圣西门、欧文、傅立叶，一直到马克思、恩格斯，以及叔本华、孔德、费尔巴哈……以上名单，也未全录书中，而这本书本身也只能是挂一漏万。

可是，这一段时间内，从李贽、黄宗羲、顾炎武起，到后来的龚自珍、严复、康有为等，中间却整整空白了几百年——阿弥陀佛，不似人家的“千年黑暗王国”，可人家这几百年，却远远超过了那一千年，出了那么多大思想家、大哲学家，当然，还有大科学家、大发明家，而我们呢？我们这几百年间，尤其是所谓的“康乾盛世”，又出了什么？

这一比较，我们多多少少便看出什么来。

当然，这部《断裂与重构》，也是建立在这种比较上面，不仅不是思想史上历史人物的比较，历史人物出现的频率的比较，而是整个思维发展、演进的比较，而这种比较，当更能发人深省。

正是循这一思路下来，才有了这么一部“奇书”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这构成了我在理论研究上又一个“三部曲”：从《中国文化史观》开始，到《思想家的命运》，而后便是这部《断裂与重构》。

当我们在第二部中列数那么多的思想家，他们在思维领域中的纵横捭阖，有着那么丰富多彩的创见与建树之际，再来想想我们在近代的空白与苍白，当又会有怎样苍凉的感觉？是的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还能以泱泱大国自居，以几千年古老的、未间断的文明自诩吗？

回顾一下东西方，当然，不仅仅是指欧洲与中国，也包括其他文明，其不时盛开的思维的花朵，正是连缀人类历史的华彩乐章，那么，我们怎样才能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上，去评估这一切呢？

我们常说，叩问历史，方知人性，人性无疑是人类中共同的属性；向往美好、完善，这样的人性，当然不是任何一个文明所独占的，而是共有的，而且当成为各种文明理想中能共通的目标，纵然由于不同的文化误解会使这种共通性产生模糊。

然而，无论东方，抑或西方，任何一种文明，倘若不通过吸

收、扬弃其他不同民族或不同文化所体现出来的思维成果，从而武装自己，充实自己，那么，只可能是在空谈人性或空谈理想罢了。

正如我们说东方的悟性与西方的解构主义一样，如光说互相一致或太相似，不必相互补充，自然是大谬特谬；但如说双方相互排斥，水火不相容，那就更加荒诞了。彼此当有比较、分析，加以研究，才可能相互有所提携。任何一种固执，都非明智之举。

正是这悟性，令我想起了泰戈尔曾经在《东方与西方》中说过的一段话，大意是这样的，在漫长的岁月中，在源远流长的生命历程里，东方人与西方人曾经相遇过，那时候，东方人所拥有的向往“无限”的神秘主义思维，对西方人在精神生活上的安定太有必要了；反过来，对东方人来说，从西方传入的先进科学技术，以便自己得到一种安定，也是必不可少的。

只是我们得到的这种安定，物质生活上的安定，足以与精神生活上的安定相媲美吗？单纯的精神与物质之分，在东方似乎也是不可取的，物质里有精神，精神未必超然于物质——这么说，东西方的简单划分也一样。

而我这里，则把西方思维的演进，与中国思维的演进交互在一起，乍一看，西方逻辑的演进似乎颇为具体，而东方则显得更为抽象，这自然同文化的渊源有关系，而这里是否也包括泰戈尔话中的“互补”的意义在内呢？而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，对方所作的批评，是否也因此被掩盖了呢？

我不知道我这部作品会导向一个怎样的结果。也许什么也没有，似乎自己也没有这样一个强烈的需求。

但很明显，在此书的最后一部分，对自身的反省要更为突出一些。无论是关于生态思维上面，还是所选取的加以剖析的个案上，这种反省绝不会是温吞水的。

中国改革开放已经 20 多年了，但我们业已形成的、传统的思维定势，究竟有了多大的改变呢？当然，相对于历史长河而言，这 20 多年只是一瞬间，我们不该有太大的奢望；但对于历史的某个转折点而言，却当是一天等于 20 年，无论如何应该是有大的改变！

但事实又怎样呢？

就算有变，却也很小很小……中国人的思维模式，要变更它并不容易，尤其是“文革”劫余，思想的劫难是最深刻的，我们迄今未从这一劫难中走出来，因为这是最为困难的。也许，这正是这本小书的一种潜在的期盼。所以才有了书末不那么令人振奋的章节。

自省方是更新的良方，一如凤凰涅槃。“众生本来是佛”，佛性人人都有，只在乎你自己找到了没有。禅宗对中国思维的影响，当也称得上“晴天霹雳”。今天的悟性，对于中国人挣脱“文革”思维或实用理性思维，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。

但思维的发展，已不可似过去那样止步或干脆断裂了，在当代的日新月异中，任何的延误，后果都不堪设想，现在不是什么“平行发展”的时代——如春秋战国与古希腊罗马，而是我们应有一个飞跃或跨越，后来居上，我们应有一个雄视古今、纵横东西的胸襟，去构建思维史上的新篇章。

登高壮观天地间，
大江茫茫去不返。
黄云万里动风声，
白波九道流雪山。

我们已经感觉到了这种山崩地裂、翻江倒海的风声了吗？

第一章 语言与思维方式

思维方式，不独东西方有异，甚至在同一民族中，如中华民族，由于南北地域的不同，也是有差别的。及至南方，同一民族，由于支系的不同，如广东的广府人、客家人、潮汕人，各自的思维方式，也都不尽相同。可以说，不同的国家、民族，由于社会演进的快速、缓慢与停滞，历史发展的跌宕、起伏与平缓，文化传承的肇始、转换与融会，心理上的封闭、麻木与开放，都对其思维方式产生重大影响，它们本身就是思维方式凝练、继承与发展的机制，反过来，亦是思维方式所必然导致的结果。所以，思维方式亦是民族精神的核心，对民族心理与民族性格的塑造起决定性的作用，是形成不同民族性格、显示不同民族形象的内在因素。

思维方式的形成，是有其历史的。不同的思维方式，与不同的历史文化的演进息息相关。为什么有的民族的思维方式，偏重于形象思维，而有的民族，却有发达的抽象思维；有的思想家，极力营造、构建其庞大的思想体系，而另外的，则讲究发散式的、感悟式的，对体系不屑一顾；……美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还认为：“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，中国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。”可见，各自思维方式的发展，有着各自不同的路径，不曾归于一律，如果不加以比较，便会陷于麻木与错愕之中。尤其是今天，中国改革开放在不断推进，外来交往与日俱增。要与国际上不同的民族打交道，假若不了解人家的思维与行为方式，势必做出错误的判断，差之毫厘，

失之千里。早些年,若干反映中西思维方式及文化差异的文学艺术作品,之所以那么引人注目,是与人们所面对的现实情状有太深的关系。诸如报告文学《无效护照》、《白波九道》,还有电影《刮痧》、《推手》等等。不同思维方式、文化模式的碰撞,引发了刚刚走出国门的中国人的不断提升、扩展的思考。也许,形象大于观念,人们从这些形象性的作品中得到的教益,总比枯燥的理论陈述要多得多。可以说,短短 20 余年,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已有了不少的变化,这与改革开放的推进是无法分开的。毕竟,思维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概念,思维方式更不会一成不变。

不同民族的思维,均是以其不同的语言为载体或工具,通过语言表达出来。二者是不可或缺的。因此,语言对于思维方式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决定作用。换句话说,语言本身是思维方式中最稳固也是最直接的因素。

为此,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就认为:“我的语言界限意味着世界的界限。”语言与世界之间存在着先天的同构关系,我们只能透过语言去看世界,通过对语言的分析达到对世界的分析。而语言或思想能够成为现实的构象,是由于二者之间存在着逻辑的同构。“留声机唱片、音乐构思、乐谱、声波,彼此之间均具有语言与世界间所有的那种表象的内在关系。对于这一切,逻辑结构都是共通的。”

其实,维特根斯坦和老子《道德经》格言式的著作是否真那么难懂呢?恐怕,这与东西方语言的转换,有着很大的关系。我们不妨挑选几个“字眼”来比较一下。

20 世纪 50 年代,香港出现了“水浸银行”的现象,当时东南亚不少商家都把钱存在了香港银行,因为在当时动荡的亚洲,唯余香港是安定的绿洲。只是,“水浸银行”怎么理解?对广东人来说,这好理解,“以水为财”,水意味着钱财。这是具有海洋文化传统的广东人的日常语言,但用到北方,人们就不理解

了。不过，这个词组真正鲜活、生动之处，还在于英文，因为，英文中的 bank，不仅仅是“银行”的意思，而且还有“堤岸”的意思，所以，“水浸银行”的 bank，当是一语双关，变得非常形象、生动了。水浸过堤岸与钱淹没了银行的严重程度，在这组词中得以充分的体现。人们常说，读原著得到的乐趣，比译本多得多，道理也就在这里了。

我们再来看一个词，现在很多中国人也熟悉了：stock——股份、股本、股票。如普通股 common stock、优先股 preference stock；股份公司 stock company、证券交易所 stock exchange；等等。但这个词还有别的意思，而且是原始意义，当是树干、根系；祖先、谱系；类族；原材料；等等。而且在口语中，还包含信任、看重与相信的意思。这几层含义，就中文而言，是风牛马不相及的，股份与谱系、树干有何相干呢？与信任又怎么能是一回事呢？

我们不妨再找一个词：magazine。如今大部分杂志，都配上了这一类文词，它本就是杂志、期刊的意思。假如有人告诉你，过去翻译小说中通用的“马克辛”的原意就是这个词，你一定会大吃一惊，因为大家都熟悉，“马克辛”就是指机关枪。这杂志与机关枪，在中文里绝对不可能是一个词，同样是风牛马不相及的。

那么，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？

我们还是回到语言与思维方式上来。可以说，一种语言就是一种思维方式。汉语思维与英语思维就很不一样，因为思维本身所依靠的载体不一样，所被带往的方向就不同了。

我们先来看看 magazine。

杂志、仓库、机关枪，在英语思维中，就有着一一种内在的、抽象的逻辑联系。杂志是有诸多栏目、把众多文章组合在一起，它是文章的“仓库”；同样，机关枪同一般的步枪之类不同，它

是可以连发的，有很大的弹仓——子弹的仓库。所以，magazine，包括杂志、仓库、机关枪、胶片盒、底片盒等多重含义，其间的抽象逻辑：组合、汇聚，于这些事物都是一致的。但中文从形象思维出发，文的杂志与武的机关枪，书与枪，怎么也联系不到一起。

同样，英文中的 bank，既是堤岸，又是银行，都是“存贮”水与钱；它还有（一）排、（一个）系列的意思，而且还有动态的存入，以及指望、信赖——bank on。我们不难看到当中的抽象逻辑联系。

stock 到此，也就更好理解了，为何股份与根系，更与信任都是“一回事”了？这似乎已经不用解释了。

我们还可以找到相对应的词，说明汉语思维又怎么与人家的不同。如我们的热、烫、辣等表现丰富的词义，到了英文，却只能单调地用 hot 的不同等级来表示。

无独有偶，维特根斯坦在《文化和价值》中说过：“有时，一个句子如果只在适当的速度上来读，可能会被理解。我的句子完全应该慢慢地来读。”

中国国学大师陈寅恪也说过类似的话，“凡中国之韵文，诗赋词曲无论矣，即美术性之散文，亦必有适当之声调。若读者不能分平仄，则不能完全欣赏与了解，竟与不读相去无几，遑论仿作与转译”。他举例以“听猿实下三声泪”与“听猿三声实下泪”作比较，前者有平仄之分，后者无，“讲授文学，而遇此类情形，真有思维路绝、言语道断之感”。

为什么他称“我们的母语，远胜于我们自己”？因为母语，是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、世界观与价值观所系，是我们的整个世界。你要理解别人的语言，你才可能掌握别人的思维方式，方可以进入到另一个世界。中国传统强调的是“安土重迁”，而中古形成的客家民系，却一反传统，讲“宁卖祖宗田，不卖祖宗